

太虚法师在庐山弘法期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

何 燕 生

提 要：本文以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所见的与太虚有关的史料为中心，具体考察了 1924 年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与日本的关系。第一部分考察当时庐山日本人的居住情况，指出太虚与日本人的直接交往即始于这个时期。第二部分考察日本派遣官方代表团参加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的背景，指出围绕翌年在日本东京召开后续会议的名称，日方力避“世界”而强调使用“东亚”的原因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而日本民间（佛教界）试图积极与太虚接触，强调“日中亲善”，有其自身的诉求。本文最后指出，“从日本看太虚”，利用日本外交档案考察太虚，故纸寻珍，可以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看到一位鲜活的历史人物太虚形象的存在。

何燕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珞珈学者”讲座教授，武汉大学国际禅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日本郡山女子大学宗教学专职教授。

主题词：太虚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 世界佛教联合会

太虚（1889—1947）生当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为了回应近代性的挑战，太虚提出了一系列佛教改革的主张；以僧团自身建设为目的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以培养佛教人才为目的的佛学院的设立，以济世利人为宗旨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理念等，这些不仅为当时的佛教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为之后的佛教发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当我们历史地审视太虚一生所推行的一系列的佛教改革运动时，不难发现，日本佛教的存在，不可忽视；无论是在太虚极力推动的僧伽教育和佛教文化事业中，还是在太虚提出的“世界佛教运动”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日本佛教的影子。特别是结合日本保存下来的相关史料，我们还可了解到，太虚与日本佛教的关系似乎经历了一个从“借鉴”日本佛教的经验，到试图“联合”日本佛教界一起回应西方异文化的入侵，最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扩张和侵略而演变为“抗日”这一极其不平凡的历程^①。

太虚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②，自那以来，汉语佛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从日本发现太虚”的研究路径，一直以来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空白。即便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已经出版却直到近年才在汉语佛学界开始受到关注

且似乎带有一种被“热捧”意味的 Holmes Welch（霍姆斯·尉迟酣）的研究，情况同样如此^③。至于日本，有关太虚的研究，可以说目前尚停留在一般的介绍性阶段，并未形成一个课题^④。尽管太虚与日本佛教的关系密切，在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近代中日佛教互为背景和资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我们研究太虚，不得不重视日本方面的史料；从日本看太虚，是太虚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视角，而仅仅局限于太虚本人的文字和中文一方现有的史料，“用太虚研究太虚”的方法，或者“复制”太虚的说法，不得不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宗教神学的研究范式，不仅在方法论上失之客观，而且在一些事件的分析与理解上，也会给我们留下许多疑问。比如就太虚在庐山大林寺期间的活动来说，为什么稻叶圆成特地去大林寺拜访太虚？日本驻九江领事馆江户千太郎领事提出让日本佛教徒也来参加太虚举办的讲经活动，真的如太虚所言，是因为江户是“日本的佛教徒”吗？再如，翌年日方派遣代表团参加第二届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结束后，中日双方围绕翌年在日本召开第三次会议的名称与规模，针对太虚提出的仍然沿用“世界佛教联合会”名称的提案，日方力避“世界”而强调“东

亚”，且大谈中日两国佛教之间的“双边亲善”，其表面上的台词虽是为了“务实”，但其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背景？日方代表结束庐山的讲座回到日本后到底说了些什么？太虚说当时庐山有许多日本商人在那里开旅馆，当时庐山的情况到底如何？等等。关于这些疑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现有的中文资料是难以弄清楚的。而要想弄清这些疑问，需要我们转换视角，从日本寻找线索。

本文即是以被日本国家公文资料库作为“外交史料”保存下来的与太虚相关的档案为中心所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具体围绕1924年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召开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运用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研究太虚以及近代中日佛教交流的历史，在目前海内外的学术界，应该是第一次，在史料上，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与此同时，为了便于对“事情”的经过进行较为客观的把握，本文在论述的过程中，尽量结合太虚自己的文字和现有的中文的相关记载，同时也不放弃对日本相关期刊报纸的利用。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国家公文馆目前公开的档案并不是档案的全部，资料上受到制约；其次，即便是全部公布出来了，所保存下来的史料也未必就是“事情”的完整记录，难以还原“事情”的真相。再者，档案本身所载的内容，其实也有它的局限性，需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它的“史料价值”，不能盲信。

一、1924年“世界佛教联合会”前后 在庐山的日本人

1923年，太虚开始恢复庐山大林寺，举办暑期讲经活动，并发起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倡议。太虚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日本佛教界的注意，大谷大学稻叶圆成专程来大林寺拜访太虚。同时还引起了日本当时驻九江领事馆领事江户千太郎的注意。太虚在《自传》里回忆说：“尤其那领事江户是个日本的佛教徒，竟来以日本的佛教徒名义，加入世界佛教联合会，并电日本以次年推派佛教代表来讲演，并参加世界佛教联合会”^⑤。次年，“世界佛教联合会”如期在庐山召开，日本派来了以“法相宗长佐伯定胤，及帝国大学梵文学博士木村泰贤”^⑥为代表的团队参加，并轮流讲演。而且，讲演会结束后，“另开了两天会议，出席的日、德、英、法、芬九人，中国代表十余人，讨论了些中日如何交换教授学生，及如何对暹罗等唤起联合，并向欧、美宣传佛教等议题。形成决议的，则为第二年在日本召开，

定名为‘东亚佛教大会’”^⑦。总之，这个被太虚自己后来说成是“弄假成真”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开启了太虚“世界佛教运动”的重要一步。

说起佛教史上的庐山，我们总会想到东晋时代的慧远（334—416）在庐山结“白莲社”，宣扬佛教净土法门的历史。庐山，作为佛教的名山，一直以来令无数佛教信徒心向往之。然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这里“只盛耶教，不闻佛声”，“自牯牛岭开辟避暑区之后，周围十里间只有耶稣教堂林立，退处偏远的僧侣佛徒，久已无立足的余地”^⑧。堂堂的佛们净地，竟变成了“洋人”传播基督教的圣地，沧桑巨变，令人叹息。

一座佛教名山，在风云变幻的上世纪初叶变为“洋人”的“基督教区”，这当然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关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庐山基督教的传播及其“洋人”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当时居住在九江的英国传教士、商人李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 1864—1939）的《牯岭开辟记》一书中了解其大概^⑨。据载，李德立当时在庐山租借了一大块土地，并开发为避暑区，供人（主要是外国人）度假之用，也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教会。《牯岭开辟记》记载了他开发庐山避暑区的经过，其中涉及到当时基督教在庐山的传播以及“洋人”的情况。那么，当时庐山的佛教以及与日本人的情况如何呢？《牯岭开辟记》未有记载。

其实，当时庐山的佛教情况，特别是日本人的情况，在已刊行的汉语文献中，除了太虚的文字外，我们似乎无从知晓。太虚说，这里“是国际避暑区，中外人士都宣扬基督教，差不多是耶教徒的势力范围”^⑩。因此他当时带着几位徒弟从武汉来到这里，其实也并不是为了修复祖庭，更不是为了“朝圣”，而是向洋人传布佛教：“我们在庐山演讲佛学，无异走进了基督教区宣传佛法；当时来听讲的，也有外国洋人的耶教牧师”^⑪。尽管太虚当时有重振祖庭，还我佛教圣地尊严的弘愿，但实际上，这对当时的太虚来说，似乎已力不从心了。其实，太虚坦言：“不想把古式寺院恢复，只须作一讲堂及造些办事人房子，临路造一古大林寺门坊便可”，“在一间木屋里，陈了一些桌椅，不特没有举行佛教仪式，就连佛像也没有”^⑫。

太虚刚开始讲经时，虽然听讲的人群中“也有外国洋人的耶教牧师”，引起了“外国人洋人”的留步观望，但效果似乎不佳，只有日本人予以

了积极的回应。太虚回忆说：讲堂前做的一块“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大招牌，竟“引起斜对面的日本旅馆及九江日本领事、银行等避暑人员的注意”^③，并且促成了后来“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以及“东亚佛教大会”的召开。太虚这里的记述，虽然语焉不详，但为我们了解当时居住在庐山的日本人的情况提供了线索：日本人曾在庐山经营旅馆，而且该旅馆位于大林寺的斜对面。

其实，关于包括庐山在内的当时九江一带的情况，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中保存了大量的档案，内容涉及地理、自然、物产、矿产、水源、工业、农业、政治、经济、卫生、当地人的排日情绪以及在九江的日本公司、私人企业、银行、居住人数等方面。这些档案中，也有关于当时在

庐山居住的外国人的数量以及传教士情况的调查，且内容颇详。而关于日本人的居住情况，有如下几份档案，可供我们参考，值得介绍。

第一份档案标题是：“13. 九江领事馆”。收藏在“外务省外交史料观”“战前外务省记录”“3 门 通商”“4 类 财政及经济”“6 项企业”“支那二於ケル本帮人ノ发展及状况杂件”/“在支本帮人ノ企业及贸易调查ノ件”第八卷。共 12 页。记载事情的年代：大正 12 年至大正 13 年（1923—1924）。档案作成年月日：大正 12 年 3 月 15 日至大正 13 年 6 月 12 日（1923/03/15—1924/06/17）。档案机关：外务省。

该档案的影印件如下。这里只转载其中的第一页和第五页。

The image shows four pages of a Japanese colonial survey document. The title at the top of each page is '在九江日本領事館事務代理藤井啓二執筆' (Written by藤井啓二, Survey Agent of the Japanese Consulate in Jiujiang). The pages contain handwritten Japanese text and tables listing various businesses and their details. The first page (leftmost) lists several companies, including '大元洋行' (Daigen Yōkai) and '仁德洋行' (Ninde Yōkai). The second page (from left) continues the list. The third page (from left) shows a table with columns for company name, capital, and other details. The fourth page (rightmost) shows a table with columns for company name, capital, and other details.

从内容看，这份档案是大正 12（1923）年 3 月 14 日，由驻九江领事馆事务代理藤井启二执笔，呈报当时的外务大臣伯爵内田康哉的，而“关于在中国日本企业及贸易调查”，是受外务大臣在上月 23 日来函的指示而进行的。报告分正本、副本共三份。调查范围为九江领事馆管辖区域。按“组织名称”“代表人姓名”“营业开始年月”“所在地”“支店及本店各所在地”“资本额・公称与已入帐情况”“营业项目”“在中国或各居留管辖地税务纳税情况”“备考”等项目进行调查统计。从这份调查报告，我们知道日本当时在九江的“公司企业及商事组合”有：“株式会社台湾银行九江支店”“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九江出張所”“株式会社草叶洋行出張所”“株式会社平和公司”（经营陶瓷器用颜料）四家；“个人经营企业”有：永和煤炭公司（石炭采掘及出售）、“大记公司（中日合资，锰采掘）”“鸿池铁工所街字”（中日合资，南深铁道栋梁及机关车修理）“丸三洋行”（中日合资，贩卖药品及杂货中日合资）、“上海铃木洋行代理店”（中日合资，贩卖樟脑及樟脑油）、“大元洋行”（中日合资，进口并贩卖食品及旅馆业）、“仁德洋行”

（中日合资，批发洋杂货）九家。但对各家的所在地未作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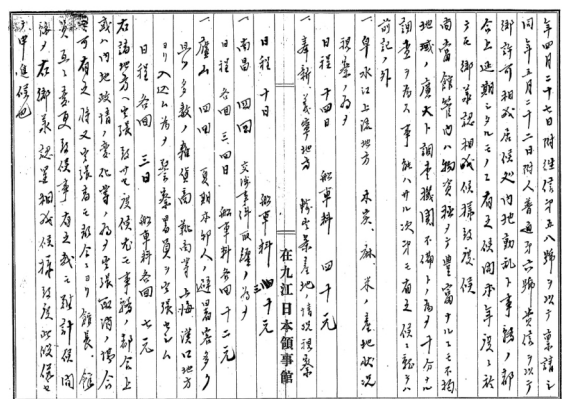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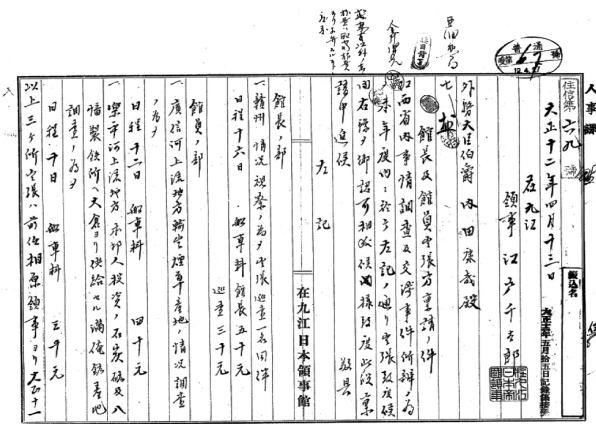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在九江确有日本人经营旅馆业（合资）。至于它是否设在庐山，是否太虚所说的那家“斜对面的日本旅馆”，从该档案中我们不得而知。其次，在以批发“洋杂货”为业的“仁德洋行”的“业态”（即经营状态）一栏中写有“暑期在庐山设支店”的字样（见上右影印件最后一行）。可知当时庐山的生意旺季是在暑期，这可以为太虚之所以选择暑期在庐山举办以“洋人”为对象的讲座活动，提供了一个注脚。

其实，这份档案所载的由“大元洋行”经营的旅馆，叫“大元旅馆”，其“分馆”的地点就是位于庐山大林寺旁。这可以从 3 年前即 1920 年到访庐山的日本佛教学者常盤大定的记载得到证实。常盤说他们一行于 1920 年 3 月到达庐山时正赶上下雨，在“大元旅馆”的主人增田久次郎的引路下，与前来会合的堀幸寿一起，一行共四人，雇了三台轿，列队前行。而且还说，当时的牯岭街酷似日本的箱根，十分繁华，日本人住在由传教士经营的租借的别墅

地带；租界的最南端是大林寺的寺迹，而“大元旅馆分馆”就位于此地。常盘还记载说，在“大元旅馆分馆”建成之前，来自日本的避暑客人一般都投宿在由日人经营的“竹内照相馆”^⑩。常盘去大林寺的时间是大正9年（1920），与太虚在大林寺的时间和日本驻九江领事馆的调查报告的时间虽然相差3年，但三者的记述所反映的事实，基本相吻，这为我们了解太虚当时在大林寺与日本人的接触，进一步提供了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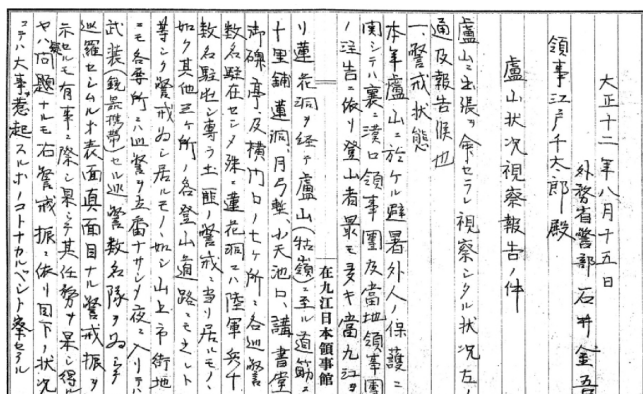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还显示，江户千太郎的确去过庐山，目的是考察暑期来庐山行商和度假

的日本人的情况，而且每年暑期要去4次，每次3天。每次都有警察署警官随行。下面是他当年向日本外务大臣申请的出差报告的影印件。该档案标题是：“8.5. 九江”。收藏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战前期外务省记录”〉“6 门 人事”〉“1 类 官制及管职”〉“6 项 出張及巡迴”〉“帝国官吏出張及巡迴杂件” / “在外公馆之部 第三卷”。所藏馆内资料查询号：6-1-6-2-3。档案作者：在九江领事馆江户千太郎。年代范围：大正12年（1923）。档案制作年月日：大正12年4月13日至大正12年5月1日（1923/04/13—1923/05/01）。档案机关：外务省。



关于去庐山出差的文字，见于第二页后半部分“庐山 四回”字样。接下来是说明出差的理由，意思是：“暑期日本人避暑客颇多，且多数的杂货商、鞋商等都从上海、汉口地方赶来，故希望能让警察署员一起随行，日程每次三天，船车费每次七元”。这份申请出差报告提交后，很快得到了外务大臣的批复，同意江户领事的出差申请。该批复也被附在了这份档案的后面，归为一个卷宗。

还有一份档案显示日本驻九江警官去庐山巡逻回来的出差汇报，具体记载了当时庐山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的人数和日本企业的情况。该档案标题是：“9. 在九江”。收藏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战前期外务省记录”〉“6 门 人事”〉“1 类 官制及官职”〉“6 项 出張及巡迴”〉“帝国官吏出張及巡迴杂件” / “复命之部” / “在外警察官 第二卷”。共6页，正文5页，影印件如下：





档案名称为“石井警部庐山状况视察报告ノ件”，由领事江户千太郎报呈外务大臣伯爵内田康哉。内容分“一、警戒状态”“二、日本人避暑客及商人状态”“三、外国人避暑状态”和“四、卫生状态”四部分。其中在第二部讲到，仅从上海过来的日本“避暑商颇多，除临时性避暑客外，实际上达二十四户”，而“从其他方面过来的有七户，共有一百一十三人”。他们的职业是：“杂货店一家，制鞋贩卖商两家，宿屋（即旅馆—引者）一家，写真业（即照相业—引者）一家”等。而且还记述道：“杂货店……特别是在宣教师下山之后的年末，‘圣诞节’所需的玩具等一切都从该店购买，大部分都会售空”。特别是其中提到了大林寺，说：“日本的避暑客几乎都住宿在牯岭大林寺西街出租的房屋或者自己的住宅，因此能看到他们过得很安逸。而庐山的支那人对日本人的评价极其良好。……住在这里的人看不到有排日的气氛，都说心情舒畅。”关于外国人的避暑状态，该报告说，欧美来的避暑客“总人数约二千五六百名……欧美人中的避暑客都是各派传教士及其家属……但因生活习惯，常引起支那人的反感，最后都改信（其他宗教——引者）了”等。

另外，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也做了一份关于牯岭外国人情况的调查报告，被保存在日本国家公文馆。该档案标题是：“2. 大正 3 年 2 月 14

日至大正 12 年 11 月 30”。收藏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战前期外务省记录”“1 门 政治”“6 类 诸外国内政”“1 项 亚细亚”“各国事情关系杂纂/支那ノ部/汉口第一卷”。据这份档案，来自牯岭 Council 发表报告书称，1914 年夏季居住在牯岭的外国人数分别是：英国 476 人，美国 456 人，德国 48 人，瑞典 35 人，芬兰 25 人，挪威 15 人，俄国 12 人，瑞士 9 人，日本 7 人，法国 4 人，比利时 1 人。共计 1091 人。临时避暑客 96 人，支那人 883 人，而关于“支那人”的人数后面有一括号，注明：“支那人大部分是西洋人的雇工以及以西洋人作为顾客对象的商贩者”。

通过这些档案，可知日本人在 1914 年不足 10 人，而到太虚来大林寺讲经的 1923 年前后，庐山牯岭的日本人数增加到了 110 余人。随着九江日本领事馆的开设，一批日本股份公司和私营企业也纷纷搬到了九江或者庐山，其中一些“杂货铺”和旅馆都在牯岭开有分店。而且还知道日本人当时大部分居住在牯岭大林寺附近，大林寺附近变成了日本人的主要生活区域。从档案和上述常盘大定的描述看，太虚在大林寺讲经的那两年，可以说大林寺附近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日本人街”；太虚当时在大林寺讲经，引来日本商人和九江日本领事馆江户领事前来听讲，其热闹场面，我们不难想象。

其实,据当年穿梭在中日佛教界、政界和商界且与太虚个人具有深交、后来还成为“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和“东亚佛教大会”日方主要联络人的水野梅晓的记述,当时对太虚的讲演深感兴趣的,是江户千太郎领事。

他(指江户千太郎一引者)去庐山避暑地,看到颇似日莲上人当年“路旁说法”的场面,即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木屋墙上悬挂着“世界佛教大会”的招牌,旁边用英汉两种文字写道:“愿意听佛法的人,随时欢迎”。看到这个招牌,江户感到好奇,便发生了兴趣,最后进到那间小木屋内去听讲经。以后每天都来。听说每天总有一位在相同的时间,穿着相同的服装前来听讲的日本人后,寺院的和尚便与江户聊起天来了,并给他倒茶,然后便问:“您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人?”江户只回答说:“我是日本人”。他当时并没有透露自己是驻九江帝国领事馆的领事,所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来渐渐地被传开了,知道他是日本的领事……。终于知道江户领事身份后的木屋的主人太虚法师,在暑期讲经大会结束而返回武昌佛学院的途中,在九江特地拜会了江户领事。他说,作为世界佛教大会的会长,想今后与日本佛教界建立关系,在明年暑期大会上希望日本能派遣佛教大家,一起演讲,希望能得到领事的支持^⑤。

水野这里的记述,非常具体而形象,似乎还原了当时太虚讲经现场的部分情况。从水野的特殊身份看,这些细节,很可能是他后来从江户领事那里听说的,应该属实。据太虚记载,江户后来致电日本外务省,转达了太虚的意愿。翌年日本便派来了佛学大家,参与太虚的讲经活动。不过,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当时江户千太郎领事的电文,在此次搜集的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并没有直接发现有收藏,只是在与“庐山佛教联合会”相关的一些档案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内容与水野的上述描述一样,一般都是重复江户千太郎与太虚的这次的“结缘”。

水野梅晓后来在回忆“东亚佛教大会”成功举办文章中,曾特别强调指出,由于有了江户千太郎领事当年细心的留意,才有了“东亚佛教大会”举办的结果,是江户领事创造了日华两国佛教徒正式握手的机会,因此,希望日本佛教界不要忘记江户领事的名字^⑥。

江户千太郎是否如太虚所说,是“日本的佛教徒”,我们目前无据可查。不过,通过对日本

国家公文管所藏战前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的调查,我们发现了江户千太郎不平凡的身世。

这份档案是关于江户千太郎逝世的悼词。致辞人是当时的外务大臣宇垣一成。档案名称:“17. 故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君ノ灵二告ク 宇垣大臣 自昭和十三年六月”。收藏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战前期外务省记录”“Z 门 先例及杂类”“1 类 先例”“5 项 事务关系”“0 目”“外务大臣祝辞及悼辞等先例”。所藏馆内查询号码:Z-1-5-0-12。所藏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作成年月日:昭和 13 年 6 月 20 日(1938/06/20)。共 2 页。所属机关:外务省。

据该悼词,江户千太郎出生于明治 17 年(1884),福井人。明治 41 年(1908)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毕业(今天的文学部),先后在鹿儿岛县和茨城县从事教育工作。大正 7 年(1918 年)通过“高等考试外交科”的考试,进入外务省,任“领事补”(即领事候补),先后在奉天(即沈阳)、天津、桑港(即旧金山)赴任。大正 12 年(1923)升为领事,历任九江、青岛、英国利物浦等地领事,昭和 5 年(1930)担任外务省“书记官”、文化事业部第二科科长,同年转入第一科,为对华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昭和 10 年(1935)担任驻汉堡总领事三年,为日德的通商和文化交流事业贡献卓著。昭和 13 年(1938)3 月被派往天津,担任总领事。而就在天津赴任期间,遭遇意外而死亡。终年 54 岁。

从这份档案可知,江户千太郎由“领事补”升为“领事”,是 1923 年,同年即被派驻九江。因此,中国九江其实是江户千太郎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江户领事不仅对太虚的演讲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据 1923 年《海潮音》第 4 年第 8 期载,在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召开之际,他还写了一份贺信,并且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还送上了贺礼:

虚师道鉴

贵会宗旨,不胜佩仰。谨具薄礼,聊表微忱,务乞晒纳为荷。专此,敬祝

贵会前途伟业无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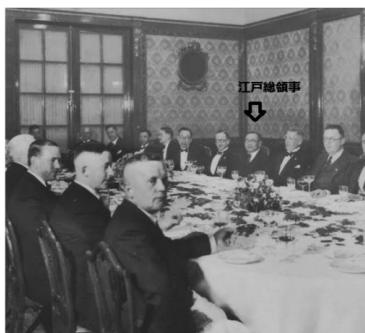
江户千太郎谨启^⑦

江户这里所说的“薄礼”,其实是“十元大洋”,这可以从《海潮音》第 5 年第 2 期《牯岭大林寺首付款目总账报告 自癸亥六月起至甲子正月止》中得到确认(“收千户太郎捐洋十元”。“千户太郎”是江户千太郎之误)。也许是因为江户一系列的举动打动了太虚,在“世界佛教联合会”系

列演讲会的主讲嘉宾中，我们看到有江户的名字。但后来似未成行（见《海潮音》第四卷第八期“世界佛教联合会函电一束”）。翌年，在江户千太郎领事的积极推动下，第二届“世界佛教联合会”在庐山隆重召开。江户领事致电太虚，通报日本代表团将如期参加会议的决定。

太虚法师鉴：

对于贵讲演会，敝国大僧正以及博学者，决定参加。故台端登山时，敝领事盼面谈，一叙详事。请台端底（抵——引者）得日期并船名，先电知是荷。江户叩^⑧。



1936 年 5 月 5 日江户千太郎在汉堡时的合影^⑨



1920 年代日本驻九江领事馆外景^⑩

总之，作为日本的政治家，江户千太郎与太虚的一系列举动，从当时的中日关系看，我们不排除其政治背景和意图，但与此同时，从太虚一方来说，我们也不排除太虚从当时中国佛教的现状出发，企图借助日本江户千太郎领事的政治地位，利用庐山大林寺演讲活动这一平台，向日本传递试图“联合”日本佛教徒、从而使得他所倡议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办得名副其实的愿望。前面水野梅晓说江户千太郎是使中日两国佛教徒“正式握手”的桥梁人物，此言并不过分。

二、强调“东亚”名称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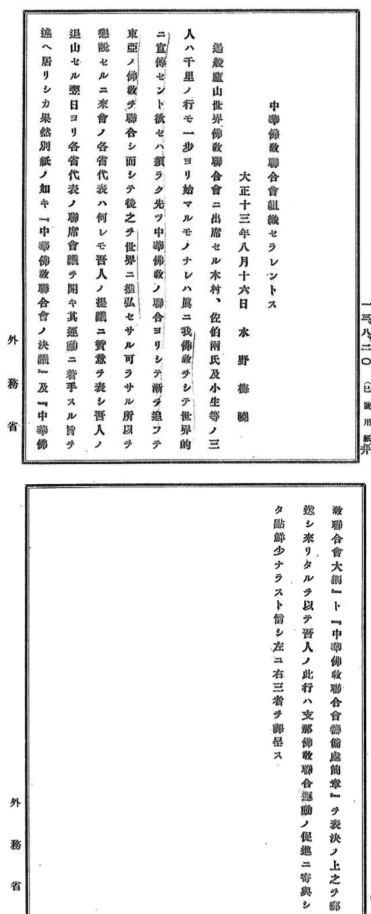
据《海潮音》第 5 年第 8 期“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报道，1924 年 7 月 14 日，中日代

表团在会后举行了“中日代表联席会”，会上太虚提议明年在日本召开联合会，请日本筹备。对此，日方代表团木村泰贤表示，“明年在日开会，是东亚各国联合会，再明年乃筹开各国佛教联合会”。太虚紧接着就会议名称提出建议：“明年开会，名称可为‘世界佛教联合会东亚会议’，以本会性质是世界，实际则是东亚。”对于太虚的建议，木村进行了较长的陈述：“‘世界’名称果佳，但形式与力量惟属东方一部分，没有西洋人加入，名实恐不相符。然我们作事总是向大的范围，如世界名称很大的，在日本开会需要有英、美、德、法加入方可，况‘世界’名称加‘东亚’名称，上面是大的，下面是一部分，恐怕敝国各宗不赞成。最好我们先由‘东亚各国佛教联合’，倘西洋各佛教国愿意加入，则名‘世界佛教联合会’未晚。敝国人做事，是一步一步的行去，若骤名‘世界’，而无世界各国加入，恐引人起误会。”太虚当即提出异议：“但此会名世界已经两年，倘明年到贵国换名‘东亚’，恐与本会初发起人原意不符。明年虽在贵国开会，若与本会离异，引人误会。”经过几个回合后，木村最后说：“明年敝国开会，名‘东亚佛教联合会’，倘后年贵国开会，仍名‘世界佛教联合会’，敝国总是情愿加入。设再换名‘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敝国也依然加入。”木村就是拒绝使用“世界”名称。对于木村的执意，太虚最后表态说：“今日于联合会上商议名称，表显中国人之理想与日本人之实践各有精神。然明年开‘东亚佛教联合会’，所抱理想，依然是‘世界’的，希望理事相契”^⑪。从商议的结果看，似乎太虚最后同意了日方的提议，带有妥协的意味，然而从“希望理事相契”字面看，太虚应该是向日方打了一个“预防针”，希望日方表里如一，有言必行。

对于日方执意强调使用“东亚”而拒绝使用“世界”的意图，太虚当时是否已有洞察，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对日方以“理事相契”的期待，则意味深长。其实，考察当时日本国内的媒体报道可知，对于翌年在东京召开会议的名称，日本国内并不像木村所言，“恐怕敝国宗派不赞成”，倒是恰恰相反，我们可以从翌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前夕，日本真言宗《六大新报》第 1139 期发表的“中华民国佛教代表者欢迎”（“欢迎中华民国佛教代表者”）的社论得到了了解。该“社论”开门见山地指出：“虽言东亚佛教大会，实际不过是中华民国与日

本的佛教家之会合。为何不加上印度、暹罗、西藏的佛教家，以谋亚洲佛教徒之联合？我们曾经发出过警告，但最终未果”^②。日方代表木村执意使用“东亚”名称而拒绝使用“世界”，其实最后到召开时，却是“中日两国”的代表而已，尽管实际上也有“朝鲜”和“台湾”的代表参加，但只是摆设而已，并无实际影响。

日方执意使用“东亚”，而拒绝使用“世界”名称，似乎是事先就已确定的方案。这我们可以从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得到了解。第一份档案即是前述佐伯定胤回国后与木村泰贤一起在外务省所做的报告会（档案编码：B12081587500）。在报告会上，佐伯这样叙述当时的过程：“十四日讲演完后，我们就明年在日本召开世界佛教大会事，举行会议，当时日方表示，召开如此大会，我们以未被赋予任何权限作为理由，回避表示决定性意见，承诺回国后，将此事向佛教联合会汇报。然就大会名称，日方提议应该名副其实，将‘世界’二字修正为‘东亚’。太虚主张使用‘世界’的说法。最后世界佛教大会同意（日方）这一提议，决定明年在日本召开时，作为其延续，称‘东亚大会’。”可见执意使用“东亚”，是日方事先已经决定了的方案。



还有一份档案，标题“21. 世界佛教联合会第四次开中华佛教教席会议决案十四条 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简章 中华佛教联合会大纲”，收藏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战前期外务省记录”）3门 通商〉“10类 宗教、教育及学艺”〉“1项 宗教”〉“宗教关系杂件 第五卷”。档案编码：B12081587600。所藏馆查询号码：B-310-18-005（所藏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页数：12张。管辖机构：外务省。该档案材料由水野梅晓提供，这里我们来看看其中由水野梅晓执笔的对该材料的说明部分。

这份档案材料，写于大正13年（1924）8月16日，即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闭幕后约一个月之后。标题译成汉语的意思是“即将组建中华佛教联合会”。字数不多，全文意思试译如下：

日前出席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木村、佐伯及本人等三人，真可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想要将我国佛教宣传于世界，需先始于与中华的联合，渐次谋东亚佛教之联合，然后向世界推广。是故，经过我们的耐心劝说，参会各省代表皆对我等的提议表示了赞同。在我们离开庐山后的翌日，各省代表召开了联席会议，并同意着手行动起来。果然如另纸，表决通过了《中华佛教联合会决议》及《中华佛教联合会大纲》和《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简章》，并将其邮寄过来。因此，我等此次之行，相信对于促进支那佛教联合会做出了一些的贡献。特将三项材料附上。

从译文意思可以了解到，这是水野梅晓向外务省提供的关于中方在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闭幕后、中国佛教界成立的全国性佛教组织的“决议”“大纲”和“简章”材料的说明。据水野称，这三份材料由中方寄来。这三份材料，后来《海潮音》进行了刊载，此不赘述。总之，水野在这里所说的由“中日”佛教联合，渐次到“东亚”佛教联合，最好推广“世界”的说法，与前述木村所讲的“一步一步的行去”的调子，其实是相一致的，口径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日方执意“东亚”，应该隐藏着某种背景。

那么，其背景到底何在呢？尽管我们从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没有发现直接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一问题的线索，但是，日方代表团民间成员代表胜平大喜的演讲报告，则对此有所交待。临济宗僧侣胜平大喜作为“日本佛教联合会”民间代表的身份被派往庐山参加会议，是日方正式成

员。胜平大喜回国后不久，在由他的故乡岛根县教育委员会举办的讲座会上进行了一场讲座，讲座内容后来经过整理，以《支那及印度视察谈》为题，连载于 1925 年《岛根教育》杂志第 362 期和第 363 期。胜平大喜的讲演内容主要是回顾此次他去中国庐山参加“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前后经过，其中透露了许多有趣的信息，比如在大连街上碰到俄罗斯的乞丐，认为俄罗斯看似强国，但输给了日本，不堪一击；在北京见到“有名的释佛慈和尚”，虽然受到很好的招待，但“话不投机”；在汉口见到在日本“住友银行”工作、曾经留学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的中国人，认为有留学日本经历的中国人一定会对日本怀有好感，可是恰恰相反，该留学生却认为中国的“排日教育”是正确的，因为在日本留学时，日本的“爱国教育”使他懂得“爱国”的重要性，这位曾经有过留日经验的中国人的答复，让胜平大喜深受冲击；在宜昌碰到四位日本妇女，得知她们是受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被迫来到中国，四人都嫁给了中国人，其中一位出身于千叶县，说她们四人于二、三十年前来到宜昌，都非常思念自己的亲人，最后在四人的请求下，胜平大喜为她们的祖先诵经超度，胜平由此对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提出批评，说西方人向世界输出“基督教”，日本却向世界输出“日本姑娘”，等等。这些虽属点滴记录，然而，却道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事件”背景。也就是在这些“点滴”的记录中，胜平大喜对日本当时为何执意回避“世界”而强调“东亚”的背景，进行了交待：

去年因为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大会，也让我去讲演，所以我也去了。据说，召开世界佛教大会——是真是假，我不知道——说什么英、美、法都对其虎视眈眈，搞不好会予以阻止。既然基督教在支那已经传播甚广了，对于日本与支那的和尚聚在一起，我想他们应该不会那么产生神经质的。我们出席这次大会，并不是因为有政治家的指示，只是我们觉得应该呼吁日支亲善，所以用尽一切语言，反复强调日支相互之间应该亲善，不应该有我们是在暗地里为政治服务的误解。……如果日本（在中国）有布教权，即便日本人都走了，我们还可以以中国人为对象，持续从事布教活动。但是，因为没有布教权，所以英国警察或支那警察会利用一切手段，驱赶我们回国。无奈那些有志的日本青年僧侣，都愤然流泪回国了。关于这一

点，我在庐山的佛教大会上曾讲过，既然我们未能获得布教权，那就干脆让支那僧侣与日本的僧侣真正一起联合起来，或者日本学习支那佛教的长处，或者支那学习日本佛教的长处，以此保持长期的亲密，这是我最后的提案。支那最为有力的太虚和尚与我紧紧地握手，我们对此进行过磋商。

日本有所谓佛教联合会的组织。我最近去了一趟京都的大本山，听说今年要召开什么国际佛教大会。我说，连支那都用世界佛教大会的名称召开大会了，为何使用国际佛教大会名称呢？我向一位干事提问，他说，其实是文部省希望不要使用这种名称，因为担心用世界佛教大会名称，英美会产生疑心，觉得世界的人都会聚在一起，这样会让英美产生妒忌，惹出麻烦，所以使用国际这个名称，这样他们会觉得是在谋求日本与支那之间的亲善。这也是无奈之举……。

不幸的是，佛教家没有布教权，所以，只有与对方的和尚建立交往。尽管这种做法，范围狭小，但正因为范围狭小，可以说成功率也高。虽说支那的佛教处于衰微状态，但有巨大的潜力，其中有许多真正信仰佛教的热心的信徒。比如在汉口一带有几十年保持素食的大信徒王制明，在上海一带有王一亭那样在上海的支那人中既有钱又能写字、画画的虔诚的信徒，而且也是一位素食主义者。……支那佛教虽然衰微了，但我们绝对不能轻视它。在他们的门下，有许多佛教研究家。我们日本的僧侣如果能够与这些处在上流的人彼此结合在一起，支那四亿人中的一部分人一定会因为他们而在精神上得到滋养，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就近的来说，今天前来听讲座的在座的各位与像太虚和尚那样有地位的人底下的信徒，如果能够相互结合在一起，我想一定能够在精神方面得到日支亲善。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年龄大的人暂不管他，我希望年轻有为的青年僧侣，发奋起来，有一种去支那掘坟埋骨的骨气，去从事布教活动^⑥。

胜平大喜的这一段话，透露了两个背景，第一是日方为何积极派团出席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积极参与以太虚、王一亭等人为首的中国佛教上层人士举办的活动的意图，第二是日方此次执意使用“东亚”而回避“世界”名称的原因。关于前者，如胜平大喜所言，即为了在中国寻求“布

教”(传教)的渠道,所以需要与中国佛教权威人士建立健全的关系,强调“日支”僧侣之间的“亲善”。胜平在这里所说的日本“没有布教权”,即指日本与中国签订的“对华 21 条”条约中被删去了的在中国的“布教权”条款。据各类相关出版书籍载,当时日本佛教界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们既把矛头指向日本国内,说日本政府无能,又把矛头指向中国佛教徒,说中国佛教徒不够“觉醒”,认同基督教在华传教,却消极地对待日本希望在华“布教”的诉求,所以他们异口同声地强调中国佛教“衰微”,这也是“中国佛教衰微论”的主要背景。与此同时,他们更把矛头指向欧美,认为是欧美在背后指使中国,“排斥”日本佛教进入中国,只容许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权利,其中,如后所述,甚至有一部分日本佛教徒还认为欧美基督教在华传教的中心在庐山牯岭,而且庐山牯岭就是欧美“排日”运动的策源地^④。因此,希望为日本佛教在华获得“布教”的突破口,是第一个背景。关于后者,胜平大喜已讲得十分清楚,之所以不让使用“世界”名称,其实是日本文部省的旨意,日本政府担心使用“世界”,“英美会产生疑心”“惹出麻烦”,所以力求回避“世界”名称。在我们今天看来,“世界”与“国际”名称,含意应该基本相同,但在当时,特别是对日本来说,“世界”一词似乎特别敏感。日本政府为何对“世界”一词如此敏感?胜平大喜虽然没有交待个中缘由,但是,我们知道,1905 年,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为争端而发动的日俄战争,最后以日本获胜为结局,之后,1914 年,又围绕在中国山东半岛和胶州湾租借地青岛的利益,日本与德国之间发动的“日德战争”,最后又以日本获胜为结局。日本接二连三在对华问题上的强势与扩张,无疑惹怒了欧美。一时间,日本在外交上陷入了困境,与欧美的关系,极度紧张。这或许就是日本对于在国际场合使用“世界”一词感到特别敏感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围绕翌年在日本召开后续会议的名称,作为官方派遣的日本代表团之所以力避“世界”而强调使用“东亚”的原因,也就不宣自明了。

三、让史料“说话”——代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日本民间佛教界的“布教”诉求与日本官方外交上与欧美的紧张关系,彼此绞缠在一起,演绎了一场以参加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为舞台的“佛教外交”戏剧,既有

台上的,也有台下的,而且还有续篇。翌年在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尽管是太虚的意愿所致,但最后如前述《六大新报》的社论所批评的那样,实质上变成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双边性会议。这就是淡去“世界”而强调“东亚”的结果。这当然不是太虚的初衷。关于“东亚佛教大会”,今后我们将有专文予以探讨。

行文至此,本文的任务应该完成了。然而,翻阅日本《中外日报》,我们发现有两则报道,十分有趣;鉴于其内容以及史料价值,这里拟摘译其中的一部分,予以介绍,并作为本文的结语。让史料“说话”,倒觉得更能说明问题。

一则报道是关于此次作为日本“佛教联合会”派遣的日方代表小林正盛从参加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归来的一篇采访。该报道标题是“支那の佛教研究熱と期待さるる两国佛教徒の接触:小林正盛氏名の归朝談”^⑤(意思是“中国的佛教研究热与受到期待的两国佛教徒的接触:小林正盛归国访谈”)。该报道首先介绍小林正盛此次受“佛教联合会”的委托,作为权田雷斧的代理参加中国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在演讲会上,宣讲“日本密教之概観”,7月13日抵达长崎,20日回到京都。这篇采访便是在京都举行的。

小林在采访中首先回顾了庐山演讲会的情况,说会期本来预定2日至20日举行,后来由于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延期至7日召开,小林自己的演讲被安排在第一天,“听众网络了来自中国各界的绅士、淑女,也有僧侣;由于天气渐渐开始炎热,前来避暑的人也多了起来。此事业的中心人物是年仅三十六岁的青年太虚和尚。太虚的人品和见识自不待言,在日本也很难见到这样的人物。他亲自在革命发祥地的武昌建立了佛学院,还创刊了内容丰富的杂志《海潮音》月刊,拥有广泛的信徒。然而,佛教圣地庐山,几乎全部被欧洲人占领,每年夏季,一些传教士集中在这里,相互商讨在支那的传教活动,成了基督教在支那传教的策源地。太虚对此感到愤慨,于是去年开始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举办暑期演讲活动。庐山现在跟日本国内的轻井泽一样,成为欧美人唯一的避暑地了”^⑥。

关于演讲会,小林正盛回应说,“除太虚和尚外,还有南京内学院法相宗大学长欧阳渐、在北京研究佛教的美国人、挪威人、德国人,他们都做了演讲。从我国来的佐伯、木村二位和自己也出席了。听说,去年大谷大学的稻叶圆成氏也

顺道来这里做了演讲。太虚和尚的寺院叫大林寺,是将被废坏的寺宇兴建成新式的建筑,还有可以容纳三四十人的听讲生居住的宿舍”。小林正盛还透露说,“太虚和尚的事业,有着坚实的内容,他希望日本也能够召开这样的演讲会,届时自己将率领 20 人左右去声援助威。太虚看到《海潮音》上刊登的他写给(权田僧正)翁的字,说如果真正想拯救印度、拯救亚洲,只是赋诗吟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什么我们佛教徒不发心拯救印度人民、拯救东方亚洲这样宏大的誓愿呢?太虚的话里,流露出了他自己就是以这种自觉和抱负而努力前进的愿望。目睹这些,我感到非常的痛快”^⑦。

接下来,小林谈到去南京“支那内学院”访问和杭州灵隐寺参观的情况。“看到内学院祭奉着慈恩大师和玄奘三藏的像,欧阳渐等以及学生全部是在家人在潜心研究佛教,深为震惊。又在(杭州)灵隐寺看到石雕佛像满满地刻的是金刚萨埵之类少见的密教类佛像,也为这种雄伟的装置所感动。……在支那停留期间,穿上信徒送给的支那僧侣的法衣,周围支那人都颇有好感”。小林正盛最后总结说:“我去潮州灌顶时就已感觉到,支那的佛教研究,除一部分僧侣外,可以说都被居士接棒了,而且,这一部分僧侣在接待居士方面,非常的尽力。因此,信仰佛教的支那人对日本人有着很高的信赖,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从宗教上讲,两国人的接触,对于彼此来说,应该是两厢情愿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宗教上,两国人接触的机会越多,将给国家间的外交带来巨大的影响”^⑧。

以上是《中外日报》对小林正盛的访谈的大致内容。从访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日人小林正盛的眼里,庐山牯岭是基督教在华传教的策源地,太虚年轻而有抱负,有才识,有国际眼光,不仅面对日本,而且放眼亚洲,热爱佛教;以“支那内学院”为代表,“居士”在中国已成为佛教研究的主要群体,出家僧众对居士十分敬重;中国佛教徒对“日本人都抱有‘信赖之念’”,因此,加强两国佛教徒之间的接触,有益于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等等。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了解到,小林正盛是在参加完潮州“灌顶”后,直接从潮州去的庐山。

也许是因为身兼日本“佛教联合会”常任理事要职的原因,小林正盛的谈话似带有“官腔官调”的味道,“真情”不够显露。然而,另一则报道所提供的信息,则颇富资料价值,或许能让

我们耳目为之一新。

分为上、下两期、连载于 1924 年 5 月 31 日、6 月 4 日版的以“庐山における佛教徒大会に就て”为题的报道,是一篇投稿,发自汉口,作者叫清原实全。在文章的开头,清原实全首先介绍了他写这篇报道的动机,说“在离开日本前,就通过《中外日报》了解到 7 月将在庐山召开第二次佛教徒大会,各宗佛教联合会将派代表参加,而自己此次中国之行中,参访庐山等佛教遗迹即是重要的行程之一,如果能够把顺便了解到的佛教徒大会召开的主旨和准备情况做一个报道,也许不会徒劳的吧”。基于这样的想法,清原实全把他所了解的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召开的情况,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

据清原实全报道,“佛教徒大会的主办者是住在武昌的太虚禅师。太虚禅师担任佛学院院长,在现代支那佛教中,是一位具有积极进取、德学兼备、网络了支那各省有影响力人士的人物。今夏的大会,将有更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参加”。清原强调指出,“在日本佛教在支那尚无布教权的当下,以这样的会议作为契机,派遣有影响力的人物参加,与支那佛教徒进行交流,加强友谊,进而给支那佛教徒以觉醒,那么可以说这将成为日本佛教徒对支那布教运动的第一步。而且,作为日支亲善运动,这是最有效果的,将在国交上发生不少的影响”。清原还叙述说,“(驻九江)领事也出席了去年的大会,并提供了很大的援助。不巧,领事去上海出差了,不在九江,失去了会面的机会,不过,我想,在武昌应该有会见大会主办人太虚法师的机会吧,于是便离开九江,乘船逆行而上,来到了汉口”。清原接下来对当时庐山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当下,支那佛教史上著名的庐山的牯岭,与我国轻井泽一样,完全变成了欧美人避暑欢乐的街镇,每年夏季有二三千人前来集会,而其大多数是分散在东亚各地的传教士,构成了在支那的排日运动的策源地。此牯岭一带的开拓者和租借人是英国传教士李德立。他在最初提出租借申请时,使用支那人的名字,装成支那人。地方官员不知其为英国人,后来发现后大吃一惊,但是,已成为既成事实,为时已晚,听说很后悔。这里现在建有很气派的教会和学校,已经变成了纯粹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地方了。看到佛教名山变成这种状态,作为有觉醒的支那佛教徒,是难以容忍的。通过向支那各省有影响力人士进行呼吁,由太虚法师主导的佛教大会,应运召开了。第一届规模比较盛

大,取得了好的效果^②。”

清原实全接下来这样介绍他会见太虚的场面:“我拜访驻汉口总领事林久治郎氏,目的是希望能够得到正担任支那政界大人物的洛阳吴佩孚顾问的冈野氏的推荐信。谈话中,我们谈到佛教大会的事情,总领事说他虽未见到过太虚法师,但了解到太虚法师是支那佛教界知名的人物,这次大会的召开,是一次很好的集会。要想见到太虚法师,有位在当地三菱公司任职的热心的佛教徒,叫王明福,是太虚法师的弟子,如果请他当向导,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在总领事的直接介绍下,王氏很快答应了,并由瀛华洋行的栗本(寅治)氏担任翻译。我们一行渡过长江,在武昌佛学院拜访了太虚法师。……因为事先王明福氏打过电话,所以,我们到达后,受到了隆重的欢迎。看到写有佛学院字样的很大的匾额,穿过支那式的洞门,来到一间土坯地的接待室,接待室四周墙壁上挂有许多太虚法师的肖像以及访问各地时欢迎场面的纪念合影照片。我们喝完茶,吃了一些糖果,休息片刻后,恰好是午餐时间。于是,被带到斋堂,看到了约有一百人的信徒按照佛教仪轨用餐的场面,更参观了教室的设备,然后我们在另外一间房间吃了一顿支那素菜。吃饭时,只有我们三人和一位太虚法师秘书的支那僧人。当我们快要吃完时,太虚法师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太虚法师是一位今年将年满三十六岁的壮年僧。其实,形貌非常和蔼可亲。在翻译还未来得及介绍时,他为了表达欢迎远来客人的喜悦之情,首先为我挥毫写了一幅字,充分展示了他的外交才能。”^③

据清原实全介绍,太虚向他介绍了召开“佛教徒大会”的动机:“佛教徒大会一直以来每年只是在浙江省内召开。由于渐渐为人所知,而且感觉到时代的需要,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合作也渐渐牢固起来,于是就有了召开世界佛教徒大会的机会。现在是需要中日两国人民自觉团结起来的时候。这不应该单单是国际上的当事人所做的事情,而且,在国际交往上,常常有英美人的阻止运动,因此,在国际上不可能期待中日间有更为圆满的交往,需要谋求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团结。而为了增进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亲善交流,很自然应该以中日佛教徒的联合运动为先,这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何况西欧文化现在正处于穷途落日之地步,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它,而东方文化的发挥,其实就是我们佛教真正精华的发挥,时代告诉我们,世界文化的救世主,就是我们佛教,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才对。因此,从这点讲,我们深信,世界佛教徒的一大联合尤为紧要,同时相信日本佛教徒也应该对此无有异议,希望日本佛教徒成为这支运动的中坚力量,谋求更广大的信徒联合起来。”以上是清原实全与太虚见面时,太虚向清原实全讲的一番话。清原实全最后说,“听说今夏庐山世界佛教大会将由日本佛教联合会派遣佐伯定胤僧正和高楠博士作为代表出席。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家出席,我们佛教徒将表示热烈的欢迎。”落款日期是“大正十三年五月十八日”^④。

以上是清原实全从汉口寄给《中外日本》的投稿文章的全部内容。关于后半部分所介绍的清原实全与太虚见面的情况,《海潮音》第5年第5期以“日僧参访佛学院院长”为题,也进行了报道,内容基本相同。比如说会见太虚是“古历4月13日”,清原实全是“日本融通(原文作“通融”,误,今改——引者)念佛宗的“布教师”,当时与汉口日本“瀛华洋行大班”栗本寅治一起,有汉口红十字会王森甫居士陪同,太虚讲到应该用东洋文化拯救西方文化,中日两国人民应该联合起来,特别是“中日之佛教徒,尤当努力”等等。末尾还记述说,离开时,清原向太虚“索赠品,法师当赠以海潮音二册,清原遂捐洋五元于海潮音社而别”。

与前述小林正盛的“访谈”相比,清原实全发自汉口的这篇报道所提供的信息,极具参考价值。第一,它明确指出,日本佛教在中国尚无布教权的情况下,以参加会议的形式作为契机,派遣有影响力的人物参加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与中国佛教徒进行交流,加强友谊,进而给中国佛教徒以觉醒,那么,可以说“将成为日本佛教徒对支布教运动的第一步”。清原实全的身份是日本“融通念佛宗”派往汉口的“布教师”,因此,他的这一观点,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日本佛教徒希望在华获得“布教”突破口的普遍愿望。通过清原实全的文字,我们对于日方之所以积极派遣代表团参加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的理由,可以再一次地得到确认(文中提及日方将派遣高楠顺次郎出席事,后因高楠顺次郎负责《大正藏》编纂工作,无法脱身,改为木村泰贤出席)。第二,太虚对东方文化充满着自信,他希望用东方文化拯救西方文化,而中日佛教徒应该联合起来,将东方文化“精髓”的佛教文化发扬光大。据《海潮音》报道,太虚当时向清原实全表示,“发挥东洋文化之大事,全在中日二

国人之肩上”。因此，希望与日本“联合”，一起“拯救西方文化”（即抵制基督教文化），也是太虚当时的愿望；正因为抱有这样的期望，所以太虚在会上最后以看似“妥协”的方式，勉强同意日方提议的翌年在东京召开会议的名称改为“东亚佛教大会”。这么理解，似乎更合乎逻辑。

总之，小林正盛的访谈录和清原实全发自汉口的报道，再一次地告诉我们，围绕 1924 年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召开，特别是翌年在东京召开下届会议的名称，日方执意使用“东亚”，力避使用“世界”一词，强调中日双边的“亲善”，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日本官方外交上的焦虑以及日本佛教失去在华“布教”权的困境。另一方面，就太虚来说，为了使其佛教改革事业走向世界，以回应西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压力，太虚与日本佛教徒大谈“中日佛教联合”，希望从日本佛教那里学到佛教版“传教”的经验，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暂时做出的一些“让步”，也是难免的，一切向前看。日本佛教对华的“诉求”与太虚对日本佛教的“期待”，交汇在一起，产生“共鸣”，似乎是促成第二届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隆重召开以及中日双方同意翌年“东亚佛教大会”在东京举行的关键原因。因此，如果没有太虚对日本佛教的“期待”，只是日本单方面对中国佛教抱有“诉求”，日本的“佛教外交”实力是无法得到展示的。小林正盛的访谈录和清原实全的报道，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本文最后试图将二人的文字译成中文，作为文本结语而予以介绍的理由之所在。

（责任编辑：月灯）

① 详见何燕生：《佛教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吗？——太虚佛教革新运动与日本》，《世界宗教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73—86 页。

② 1989 年 12 月香港法住学会举办“太虚诞辰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学者 30 余人参加，会后出版了《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香港：法住出版社，1990 年 12 月）。这是国际学术界围绕太虚举办的首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笔者作为大陆学者代表也忝列其间，发表了一篇习作。记得会上海峡两岸学者曾围绕太虚是“人生佛教”还是“人间佛教”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自那以来，大陆学术界渐渐地出现关于太虚研究的文章，在此之前，太虚研究可以说是一个“禁区”。

③ Holmes H. Welch,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中文译本：霍

姆斯·维慈著，王雷泉等译：《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④ 比如，末木文美士：《太虚の抗日活动とその思想》，《近代日本と佛教》，东京：トランスビュー，2004 年；大平浩史：《中国近代の仏教改革運動と南洋華僑——太虚の中国仏教会退出「事件」が示すもの》，《松本英纪教授退職記念論集》，《立命馆文学》第 608 号，2008 年 12 月，立命馆大学；坂井田夕起子：《“支那通”僧侶：藤井草宣と日中戦争》，《桃山学院大学キリスト教論集》52 号，2017 年 2 月，桃山学院大学総合研究所。

⑤⑥⑦⑧⑨⑩⑪ 太虚：《太虚自传》，引自厦门南普陀寺网络版《太虚大师全集》，<http://www.nanputua.com/nptzt/2017/taixu/pc/book/19> 第十九编%20文丛/03 自传/18 庐山大林寺的复兴.htm。本文以下引自《太虚大师全集》，均据该网络版。引用日期：2018 年 4 月 26 日。

⑨ 李德立：《牯岭开辟记录》，庐山眠石书屋，1932 年。

⑩⑪ 太虚：<http://www.nanputua.com/nptzt/2017/taixu/pc/book/19> 第十九编%20文丛/02 史传/06 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htm。引用日期：2018 年 4 月 26 日。

⑭ 常盤大定：《庐山の今夕》，《现代佛教》（大正 14 年（1925 年）6 月发行），1 月特别号第 9 号。该文后来被收入氏著《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题目为《庐山巡礼记》。

⑮⑯ 水野梅晓：《中华佛教代表的日本视察に就いて》，《现代佛教》大正 15 年（1926）2 月号。

⑰《海潮音》第 4 年第 8 期，1923 年。

⑱ 见《海潮音》第 5 年第 8 期“日领事江户致太虚法师电”，1924 年。

⑲ 转引自网络 <http://www.saturn.dti.ne.jp/~ohori/sub-sugimota.htm>。感谢网络管理者授权转载。引用日期：2018 年 3 月 10 日。

⑳ 引自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在九江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事情》，1913 年 11 月出版。收入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

㉑《海潮音》第 5 年第 8 期“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报道，1924 年 7 月 14 日。

㉒《六大新报》第 1139 期，1925 年 11 月。

㉓ 胜平大喜：《支那及印度视察谈》，《岛根教育》第 363 期，1925 年。

㉔ 胜平大喜：《庐山における佛教徒大会に就て》（上）（下），分别载《中外日报》1924 年 5 月 31 日、6 月 3 日版。

㉕②⑥⑦⑧ 小林正胜：《支那の佛教研究熱と期待される两国佛教徒の接触：小林正盛氏名の归朝谈》，载《中外日报》1924 年 7 月 27 日版。

㉙③⑩⑪ 清原实全：《庐山における佛教徒大会に就て》，载《中外日报》1924 年 5 月 31 日、6 月 4 日版。